

My Research on China: Objective Scholarship and Subjective Emotions

Philip C.C. Hua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Beijing, China, and

Los Angeles, USA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huang@history.ucla.edu

NO OCRID

我的中国研究：客观学术和内心感情

黄宗智

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Received 19 August 2025 | Accepted 6 September 2025

Abstract: Looking back at the advanced age of 84 on my own lifelong research, I can see that deep-seated emotions are certain to influence a researcher's choice of problem, viewpoint, and depth of engagement. Only if we confront such realities can we hope to both derive creative energy from them and rise above them. Emotions can become hindrances to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but can also lend them greater motive force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than "pure reason." The key is to recognize the source and necessary presence of such, so as not to be driven unwittingly by them, but rather to derive greater depth of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from them. Needless to say, the point here has to do with the deep-seated motive forces of scholarship of the author, not simply a matter of techniques of emotive expression or mode of writing.

Key words: pure reason, emotions,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mode of writing, scholarly motive force

摘要: 在 84 岁高龄回顾自己一生的研究，认识到，深层的内心感情必然会影响一位研究人员的选题、见解、投入。直面如此的实际，才有可能既从其中获取动力，也超越之。感情可以成为理解与分析的障碍，也能赋予其超越简单“纯理性”投入的更丰富的动力和更

多维的认识。其中关键在认识到其来源和必然，超越不自觉地受其摆布，适当由其获取更深的学术认识。毋庸说，这里所指的是源自作者心底的深层学术动力，区别于简单的技术性感情化表达或写作模式。

关键词：纯理性 感情 表达技术 写作模式 学术动力

我 1940 年出生于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香港，但生日却是 10 月 1 日，命运似乎必然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相关。人民共和国和其前的历史成为了我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那既是一种出于局外人视角的研究，也是一种深层的发于内心感情认同的研究。这种结合局外人的视角和内部人的感情的研究，与一般的海外中国研究专家们，也和人民共和国自身的学者们都不同。如今回顾，也许这才是我这一辈子的中国研究学术的深层特点。

我这一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不像一般美国学者们的中国研究那样，完全或主要属于一种学术旨趣，不带有深层的感情认同。当然，更不会是有敌意或情报工作的考量。但同时，也十分不同于中国自身的学者们的中国研究，因为不可避免地带有局外人的视野和感触。也许，这才是我的中国研究的关键要点——它既非作为局外人的旁观式的学术研究，也非局内人的连带内部感情的研究，而是兼具两者的追求。

固然，这不仅是一种客观层面的差异，也是我自己的特殊个性所使其然的结果。与许多学者不同，我自始便不仅将学术认作是一种研究活动，也是一种感情活动。“纯客观性”的研究从来便不是我个人认同或看好的进路；反之，我认为，学术的目的从来就不会是、也不该是一种“纯理性”的活动，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层感情的，无论作者多么想要达到理想的纯客观，也无论其是否对自身具有更全面的认识，都应如此。作为学者的给定实际是，自己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情人，无论多么想做到“纯理性”都如此。实际上，越坚决地试图排除自己的“非理性”感情的一面，越可能会更加不自觉地深陷其中。认识到自己感情因素的必然存在，才更有可能超越其局限，做到更高层次的自觉。

这不仅是因为我对“中国”带有不可避免的感情，更是因为自己有生以来一直对底层人民带有深层的认同。假装客观只可能更使自己受到这种感情的摆布。直面其存在和实际，才有可能做到超越性的视野。

固然，在未到不惑时期之前，我没有认识到此点。结果是，只可能受到一时的倾向的摆布，脱离真正深层的感情实际。自己试图做精英思想史的第一本书便如此——聚焦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实际上是受导师（萧公权老师）特别看好英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传统的主导。但结果是，我对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直都缺乏深层的认可。

其后，进入相对自觉的中年时期，才更客观地认识到自己最深层的对中国普通人民的感情和认同，结果才产出了来自自己心底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这两本得奖的书。之后，进而从理论和方法的视角来梳理了那样的研究。再其后，则转入了兼及客观和主观层面的法律史研究，并进而探索了那样的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方面的一系列特点和问题。

如今回顾，首先认识到研究主题的选择最终不仅取决于理智层面，更来自感情层面的深层倾向。对我来说，主要是对中国底层民众的感情。中年之前，选择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来研究，主要是受到导师萧公权老师的影响，而不是来自自己心底里至为关心的问题。直到自己的“不惑”年龄，方才真正进入了自己心底里最关心的研究。（为此，之后教学也尽可能避免给自己的博士生们意向性的指导，坚决要求他们自己选择，摸索出自己的深层倾向和至爱。）

认识到自己心底最关心的议题，才有可能更全心全意地投入，做到自己之力所能及，并长期坚持。当然，这并不排除之后的演变。对我个人来说，那样的演变主要是从议题本身延伸到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思考。有的人则可能会从某一主议题转入另一主议题，不可一概而论。其中关键在遵从自己最爱的选择，那样，才可能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佳、最深。

显然，我对学术的认识和设想，绝对不限于单一层面的理智抉择，而是涉及身心的全面投入。仅凭理智或仅凭感情的投入都是不可长期持续的。选择聚焦的议题好比选择配偶，须要愿意与其长期相伴，不仅在感情层面上，也在理智层面上。真正可持续的是兼顾两者的选择。如今在 84 岁的高龄回顾，认识到自己心底里最关心的议题乃是中国的普通人民，进入中年之后便一直投入那样的议题，先是聚焦基层农民社会经济的研究，而后是聚焦法

律对普通人民的含义的研究，其后是由那两大主题研究延伸出的方法与理论方面的含义研究。

人们关于学术研究的思考，多仅考虑理智的选择，较少关注感情的因素。而在我个人，如今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感情的关键作用。学术从来不是纯理性的活动，其深层动力必然也如此，甚之更多是来自心底的感情。我们要做的是适当借助那样的动力来更有力地推动自己的研究，而不是简单不自觉地听其摆布。对我个人来说，充分认识到自己最深层的感情动力，才有可能既借助也超越之，作出比较高度自觉的学术。

作者简介

黄宗智终身研究的明清至今农业-农民与“非正规经济”的五卷本专著（其中，《华北》和《长江》两本已经是第六、第七版），法律与正义体系的四卷本，和关于“实践社会科学”方法-理论的四卷本，已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汇集为13卷著作集出版。